

有缘收藏 收藏快乐

——访许云琴先生 潘建平

许云琴先生出身于松江名门人家,从小受到良好的儒学传统教育,因此他为人谦虚,处事谨慎。父辈们喜爱收藏,他从小耳濡目染,在收藏方面见多识广。从书画,钱币到瓷器,都在收藏之列。藏品档次之高令人刮目相看。

说到收藏的心情和理念,许老师来了劲头。他认为收藏要用平常心来对待,藏品的拥有是喜欢和缘分。因为收藏永无止境,而个人的力量,无论是财力还是精力,都是有限的,所以在收藏过程中设立目标一定要切合实际,不要醉心于赢利,否则会陷入泥潭,可能会招来烦恼。对于藏品的拥有,喜欢就好,不在于它的价值,比如他有一枚明代“嘉靖重宝”一当十两的古钱币,收藏过程十分“传奇”。他说,十几年前的一天在医院就诊,配药处看到一外地口音的病家为孩子取药,因支付药费所带现金不够而遇到麻烦。许老师当即解囊资助。受助者为了答谢,从钥匙圈上解下这枚古钱酬谢。许老师以“却之不恭,受之不愧”

的心情收下了。岁月的流逝,这枚古钱的价值却渐渐彰显出来了。某拍卖公司老总动员他上拍,许老师婉言谢绝了。如今,许老师盼望能找到赠给他古钱的外地朋友,想将此古钱退还给他……收藏是有缘分的。没有缘分时,它与你擦肩而过,有缘分时,绕来绕去,还是到你的手中。许老师家中客厅挂着一幅乔木、杨正新、钱行健和曹简楼四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合作的巨幅画作,其中两位画家已经作古。收藏这幅珍品是一个偶然的机会,从一位朋友处转让来的。当时书画市场十分低迷,仅以万元价格得之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此画越来越珍贵了,若以画家名分与画幅尺码估价,此画升值惊人。朋友夸他投资有限力。许老师却不以为然,买画初衷不因它今后升值空间宽窄来考虑的,只爱此画很有气韵,品位不俗。许老师说,画幅价格能升多少已不重要。得到它,就是缘分。享受情趣,才是收藏的真谛。松江是上海之根,有着悠久的历史

史,也有许多历史文物。前几年建设高潮时,许老师在建筑工地捡到两件宝贝,一件是唐五代越窑划花粉盒,另一件是唐代石刻墓志铭,都有很大的研究价值,许老师都无偿给了松江博物馆。他说,这是地下文物,为我意外所得,理应让有关部门去研究和展览,比我藏在家里更有意义。

谈到收藏圈子,许老师颇有感慨。他说,圈子里各路神仙都有,人形形色色。十几年前,朋友陪一位嘉兴客人来访,此人自称蒲画研究者,正在撰写蒲作英的学术论著,他看到许老师收藏的蒲华墨竹四屏条,说是研究的难得资料。许老师心想“宝剑赠英雄”,就慷慨割爱于他。几年后,许老师在一本拍卖图录上意外见到这四幅蒲华墨竹,底价数十万人民币。想不到“专家”研究是假,套利是真,明珠暗投,令许老师心寒一时。

谈到藏品的去向,许老师说,收藏只是一个过程,藏品不可能永远占有。若儿孙喜欢,今后留几件给他们。凡有文化价值的,将捐赠有关机构。坚持不将藏品作为致富的筹码。许老师就是用这样的心态来收藏,所以收藏使他快乐,收藏使他越来越年轻。



松江望族

2、清末望族及名人举要

前面所谓明代仕族后裔者,在清末并非都是望族,有的只是属于一般书香门第,但其中仍有一部分通过科举而考取举人或进士及第,从而维系了名门望族的称号。清末也有一部分属于新兴望族,均是由科举而进入仕途,而且科名也不限于一代,往往经数代努力方才跻身望族之列。但清末的形势已经不允许传统科举制度继续下去了,积弱积贫的中国已经使志士仁人认识到,必须向西方学习,“师夷之长技”,中国才有复兴的希望。甲午战争后,松江有一个叫童树棠的诸生对他的弟子说:“今后非闭关自守之时,他日国家取土,制艺必废,将博采西方学术以补我之阙,尔等其识之。”可见要求改革的呼声已经深入人心,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,其中也包括封建社会人才培养的核心制度的科举考试。

光绪甲辰科(1904)科考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考试,自此以后,以科举入仕作为望族产生和维系标尺的制度正式寿终正寝。松江历史上最后一批科考进士是朱运新和王廷材,他们参加了光绪二十四年(1898)考试;最后一批举人是参加光绪二十八年(1902)壬寅科乡试的杜炎和钱葆田。现在以科名为参照简述清末望族。

1、王氏家族

清末王氏家族科名最盛的是王春煦后裔。王春煦是乾隆四十年(1775)进士,官至湖北宜昌府知府,追赠道衍。因王春煦考中进士时列为二甲第一名,称“传胪”,因此王春煦以“王传胪”知名于时,本名反而不显。其第宅至今仍有局部遗存,为华亭老街三宅之一。清末王廷梁、王廷材均其后裔。王廷梁,光绪十一年(1885)举人。王廷材,廷梁弟,光绪二十四年(1898)进士。知识广博,于经史、诗赋及骈散文都有精深造诣,旁及舆地、天文历算等经世致用学问。官户部员外郎,充会典馆校对官,著有《达斋文集》。王氏兄弟科名先后相继,在清末也算是比较了。

2、姚氏家族

松江姚氏源远流长,支脉甚多。清末姚光发家族其世为明代仕族,有姚士慎其人,为明朝进士,曾任尚书。姚光发是道光二十年(1840)进士,授翰林院庶吉士,后任户部主事,不久归里,仕宦不显。但姚光发对家乡各项公益事业贡献颇多。姚回到松江时,正值太平天国战乱之后,间里萧条,但当时郡县官为筹措建设费用,决定增加田捐。姚认为战乱以后,百姓穷困异常,不宜再加捐税,力争之后,终于将田捐降至一半。姚还由郡县官任以建仓积谷,整理育婴等事务。曾主讲云间、求忠、景贤书院,参与纂修《华亭县志》和《松江府续志》。姚光发孙姚肇瀛,光绪十二年(1876)进士,授刑部主事,可能他感到当时不是奋发有为之时,于是也象他的祖父一样早早离开了官场。姚氏家族祖孙均为进士,在清末世家大族中可谓绝无仅有。(未完待续)

《松江望族》补遗(三)

王正



茸城轶闻

今松江老城人民北路东侧古为白龙潭旧址,区域范围大致是东濒采花泾,南临荷叶埭,西至西林塔,北达放生池。白龙潭水,南通小清河,北通二里泾,东出与城河合,潭广数顷。入明之后,白龙潭虽被商民侵去其半,然花晨月夕,箫鼓画船,岁时不绝,仍为松郡名胜之地。

白龙潭与“三龙桥”

白龙潭古有“龙潭八景”,引人入胜。八景是:月影潭心、西林夕照、翠华旭日、远浦归帆、芦庵听雨、大寺晚钟、堂荫遗碑、柳荫渔唱。每逢端午节,百姓在白龙潭举行龙舟赛事,总是把云水之龙的神态演绎得活灵活现。民国时期,由于战火等原因,白龙潭已无景可观;至松江解放时,仅存一个大的水潭;此后,逐渐填筑,变成一片平地。今白龙潭存世物证,为一方古老的蟠龙图饰石刻,现立于松江六中校园内。此外,中山二路“龙潭苑”小区名称,保留着白龙潭久远的文化脉息。

清代之前,白龙潭八景中未见“三龙桥”踪影。“三龙桥”(抱龙、登龙、护龙)三座石拱桥,建于清代康熙年间。这三座石桥的兴建,据说是与康熙皇帝下江南途中巡幸松江府有直接关系。

松郡“龙潭八景”虽美,但松江知府和华亭、娄县令总觉得缺了些什么。想来是缺了能博圣上欢心、以表为臣忠心的景观景物。于是,有了在白龙潭建造“三龙桥”的故事。

相传,得知康熙即将驾幸松江府的消息后,三位大人先行游潭一圈,坐

定白龙潭畔的古亭子议事。在随行府署师爷的建议下,三位大人玩了一回心照不宣的文字游戏。三人同时在三张纸上各写下心中所愿。结果,三人不谋而合,都写出了一个“桥”字。

师爷猜字谜后笑曰:心有灵犀一点通。莫非是要建造一座“连心桥”!松江知府呷了口清茶,笑而不答,命师爷笔墨伺候,继续下一节目:三人再各拟一桥名。

先是娄县令挥毫楷书三字,取桥名谓为“抱龙桥”;接下去是华亭县令出笔,取桥名为“登龙桥”;末了,松江知府大笔一挥,桥名豁然为“护龙桥”。师爷在一旁评说桥名,称三座桥名各得其所,皆有忠君之意。不过,知府大人棋高一着,桥名以护主而显忠君之心,最为妥帖。

知府脸露喜色,当即拍定,在古亭子三面筑3座与亭子隔水相望的“龙”桥。潭东南北斜向的那座名叫“抱龙桥”,潭西南北向的那座名叫“登龙桥”。这两座龙桥相互对称,规格、形态类同。松江知府取名的“护龙桥”,位于潭滨东西向,建造规格比华亭、娄县令取名的两座龙桥更高一些。“护龙桥”宽3米,长逾6米,高度与桥边民居的平房屋顶齐平。桥为条石砌成,旁置石护栏;桥东西两边街巷,东为潭东街,西为潭西街。

至于仅为博得龙颜一笑而建的“三龙桥”,康熙帝游览之后,是否有过训诫,当属“内部消息”,史书未记,故,无从得知。但从后来拆平三桥,“行人称便”的情形来看,知府、县令调用民力,建造工程浩大的“三龙桥”,委实是得不偿失,劳民伤财。



篆刻松江



松江府:元至元十四年升华亭为县,次年改华亭为松江府。篆刻:盛兰军

赵豫“明日来”的这一高招,不仅使宣德、正统年间的松江地区在移风易俗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,而且实践证明是一条成功的司法经验。

据《上海通志》所记,赵豫知松江府期间,择良家子弟为吏,训以礼法。均循节费,裁减一半吏员。奏减苏松官田重租,所辖华亭、上海两县,减去十之二三。断狱以律令为准,以情理为衷,谢绝请托。正统中,九载考绩,5000余名乡民列其政绩,要求留任。在松15年,清静如一日。去任之日,老幼攀辕,请求留一鞋作为纪念。松江人民的心里,衷心地期盼这位德高望重的知府明日来,明日来……

松江知府明日来

盛济民

而除之。不过,赵豫处理民间纠纷,却有自己的独特方式,每逢讼者至,他总是和颜悦色地说:“各位先消消气,明日再来。”这千篇一律的话不知重复了多少次,于是人们便给赵知府起了个绰号叫“明日来”,还编了一句“松江知府明日来”的顺口溜嘲笑他。但渐渐地,人们发觉,松江人争讼打官司的风气淡化了。因为凡是气冲冲来衙门告状的人,多是一时忿激,让他“明日再来”,结果是“讼者逾宿,忿渐平,或被劝阻,多止不讼”。



插队杂忆

学大寨

欧粤

1968年底下乡,正赶上学大寨高峰。关于大寨精神,周总理有过概括:政治领先、思想挂帅的作风;艰苦奋斗、自力更生的精神;爱国家、爱集体的风格。落实到生产队,就具体多了,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,大搞农田格子化和大寨式评工。

我落户的生产大队有大片低洼荡田,这年冬天开始“战天斗地学大寨,誓叫山河重安排”。每天天蒙蒙亮就起床,队长哨子一响,男男女女挑了扁担奋箕,浩浩荡荡向荡田进发。各生产小队的劳力都集中在数百亩的荡田中,虽不能说千军万马,其阵势也确实蔚为壮观。我刚下乡,闹不明白这场战斗(当时的习惯称呼)到底要搞成什么模样,只是跟着大家挑泥,日复一日,从早到晚。

农田中原来有许多坟头,在平整土地时全部被铲平。拆坟时,留下没有烂尽的棺木、砌坟的砖头,有主的各自拿回家,当柴火,砌猪圈;无主的就归生产队所有。生产队为我砌灶头,围灶面需要方砖,用的就是拆坟砖。

虽说以前没有干过什么农活,但我当时毕竟年轻,加上下乡前在家中无事,天天和街坊邻居中的几个小弟兄锻炼身体,练得浑身是劲,就力气而言,农民中比我厉害的不多,因此每天挑担也不感到吃力。

到了1969年春耕前,荡田改造完成,所有的田块大小划一,平坦整齐;大渠道、小沟纵横交叉,确实是旧貌换新颜。为此,我充满激情地写了篇

广播稿,题目叫什么已记不真切,很快就在公社广播站广播了,我很受鼓舞。这大概是我弄文字的开始,以后便“一发而不可收”。

下乡数月后,队里开评工会,当时实行大寨式评工,即根据各人的政治思想表现,劳动态度、能力和质量,确定每个人的工分级别。男劳力最高为十分,女劳力最高为八分。先评出最高得分的劳力,作为标兵,其他劳力自报互评,但成年男劳力大多可享受十分的待遇,少数病弱者也只是象征性地减少为九分七八,其差别真可以忽略不计。轮到评我时,会上起了争论,有的说我是“白脚爪”,应该是学徒待遇,最多评七八分;有的说我“力气蛮大”,在荡田里挑泥不偷懒,可以评十分。争来争去,最后还是队长拍板,评了个九分五。按规定,评工会应该每月召开一次,但队长怕麻烦,有时半年,有时一年才评一次,其他生产队也是如此,无非是求个太平。

为了营造学大寨的气氛,当时流行满村满墙写标语。大队支部书记看我写美术字还有两下子,便将写标语的任务派给了我。没有钱买油漆,就用糠煤或石灰化了水替代。墙上写得差不多了,书记让我到小学教室的屋顶上也写上一条。我没有上房的经验,提了石灰桶,以扫帚当笔,战战兢兢上了屋顶,待写好农业学大寨五个大字,已踩坏了好几块瓦。后来漏雨,学生上课时不得安生,我真该说声“罪过”。



松江闲话

“松江知府明日来”,这是一句古老的松江话。这句话最初流传于苏松之间,后来却传播甚广甚远;这句话最初是村野坊间的俚语,后来却成了富含哲理的名言;这句话最初宣泄的是嘲讽和不满,后来却寄寓了百姓们由衷的敬佩和期盼。

《明史·赵豫传》记,宣德年间,赵豫为松江知府。走马上任之初,了解到松江“民俗多讼”,人们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,动不动就兴师动众对簿公堂,不利社会和谐,于是决心根



生活茶座